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 David A. Lake 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 李槃一 01

〈長篇書評〉

- 吳豪人 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 王宇杰 09

〈短篇書評〉

- John Stuart Mill 彌爾《論自由》與近代自由主義發展 邱敏碩 17

〈短篇書評〉

- Tom Burgis The Looting Machine: Warlords, Oligarchs, Corporations, Smugglers, and the Theft of Africa's Wealth 吳可新 22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第七十七期



資深編輯顧問 石之瑜、徐斯勤

郭銘傑、黃凱莘

劉康慧（發行人）

編輯顧問 李易修、陳佩琪

執行編輯 李想容、鄭琮霖

編輯委員 王諠勉、鄭力維、李庚育、齊畢德、周思廷、

黃琪雯、黃育靜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地址：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 3366-8450

《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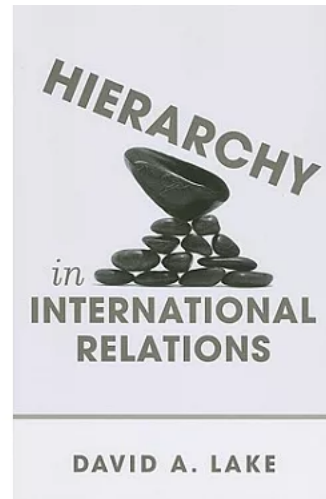
• 李榮一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學生

壹、引言

「如果國家之間缺乏權威，那麼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國權威何以變得更加脆弱？」(Lake, 2009, p. ix)

確實，如果我們花費大量力氣談論大國聲譽 (reputation)、威望 (prestige)、權威 (authority) 之益損，卻無法在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依恃一套可檢證分析的框架，而僅僅停留於嘗試性理解，那麼這類爭鳴變不免淪為空中樓閣。另一方面，若主流為求簡約而對真實存在的等級制 (hierarchy)¹ 視而不見，則難以有效解釋世局，導致理論與現實脫節，削弱學科的解釋與預測力。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知名國際學者雷克 (David A. Lake)² 於 2009 年出版的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正是對此缺口的重要回應。作者統整歷來關於權威與等級制的討



書 名：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作 者：David A. Lake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年 份：2009
頁 數：232 pages
ISBN：9780801447563

¹ 本書評重點參考中譯本《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並就術語與原版確認。關於 hierarchy 的對應詞，包括「階層結構」、「層級狀態」、「等級制」等等。為尊重中譯本用字，筆者一律使用「等級制」。

² 本書作者 Lake 之中譯名，中國大陸出版之譯本採用「萊克」。為配合臺灣學界習慣，筆者一律使用「雷克」。關於「雷克」之採用，參陳欣之 (2007)、唐欣偉 (2014)。



論，向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等三大主流理論共同接受的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提出挑戰。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引發國際社會對其權威衰退的爭議，正是該著作的時代背景。雷克認為，若要嚴肅討論美國的國際地位，首要之務便是釐清權威的概念。他提醒我們：在沃爾茲（Kenneth N. Waltz）簡約理論的網綁下，學界過於欣然地接受無政府假設，卻對國家間真實存在的等級關係選擇性失明。實際上，等級制不但存在，而且是以權威為基礎、以正當性（legitimacy）為號召。雷克撰寫此書，力求將這種幽微的事實揭露出來。

本書的結構安排正是基於此問題意識。在導論之後，第一、二章建構理論框架，分別討論國際權威與國際等級制；第三至五章則進行指標檢證，分別探討等級制的不同模式（patterns）、主導國（domination）的行為以及附屬國（subordination）的回應。在結論部分，作者展現其對世局的擔憂，並提出建言。

貳、理論建立

第一章談論國際權威。作者以政治權威的概念，根本性地挑戰無政府假設。值得注意的是，雷克並不全盤否定無政府狀態，而是承認其與等級制³

並存。他指出，政治權威乃「具有權利的或正當的統治」，核心在於被統治者集體賦予統治者發布命令的權利，以及相應地接受自身服從命令的義務（Lake, 2009, pp. 17-18）。此一權威關係與純粹的強制（coercion）不同。作者將權威與強制視為權力的不同形式，而在既有的國關分析中，對權力的分析通常局限於強制，卻忽視了正當性的作用。權威與強制皆涉及使用暴力，但能透過正當性加以區分（Lake, 2009, pp. 21-22）。權威具有不同類型，當代政治權威主要依賴於正式——法律型權威（formal-legal authority），以及作者用作核心概念的關係型權威（relational authority）。作者強調，關係型權威是一種主導國與附屬國之間的交換契約。主導國提供有價值的政治秩序（包含對人身、財產及承諾的保護），以換取附屬國的服從與承認其規則的合法性。正因有這些互惠基礎，權威才得以自我強化（Lake, 2009, pp. 28-33）。

第二章談論國際等級制。由關係型權威出發，雷克主張主權可分割，附屬國為從主導國提供的政治秩序中獲益，自願讓渡部分主權。基於權威的等級結構並非二元有無，而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當主導國規範附屬國行為的範圍愈廣，等級制的強度就愈高；

³ 本書評重點參考中譯本《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並就術語與原版確認。關於 hierarchy 的對應詞，包括「階層結構」、「層級狀態」、「等

級制」等等。為尊重中譯本用字，筆者一律使用「等級制」。



反之，若主導國幾乎無從規範附屬國行為，則國際體系更接近無政府狀態（Lake, 2009, pp. 51-52）。雷克將國際等級制區分為安全與經濟兩個維度。在安全方面，從無政府狀態依序開展的，有外交（diplomacy）、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與保護國（protectorate）；在經濟方面，則是市場交易（market exchange）、經濟區（economy zone）與依附（dependency）。安全與經濟維度的連續光譜，反映主導國對附屬國外交、國防以及經濟政策的影響力。當主導國對安全與經濟兩者的控制皆達高水準時，即構成「正式帝國」（empire）；若僅具中度控制，則是「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維度未必重合：例如，冷戰時期西歐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但經濟上仍保持相對自主；相反地，部分中東產油國在經濟上仰賴西方市場與技術，卻維持較高的安全自主性（Lake, 2009, pp. 52-59）。這些例子顯示了等級制的多樣性與彈性。

國家間可透過權威關係形成秩序，並從中獲益。這種基於權威的國際等級制觀點，挑戰了國際政治係「自助體系」的普遍想像。這兩章奠定了理論基礎，有助於我們理解國際關係中超越傳統無政府假設的複雜權力結構。

參、指標檢證

第三章探討等級制的不同模式，旨在將前兩章提出的國際等級制操作

化（operationalize），並進行初步的實證檢驗。由於權威與等級制難以直接觀察，雷克以行為指標間接測量。在安全方面，指標包括主導國在附屬國的駐軍規模與附屬國的獨立聯盟數量；在經濟方面，則透過附屬國以匯率制度定義的貨幣政策自主性，及其對主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來衡量（Lake, 2009, pp. 68-76）。確立操作指標後，作者得以將權威與單純的強制區分開來，並以 1950-2000 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進行案例檢證。分析顯示，美國與拉丁美洲（尤其加勒比海）國家間存在最高程度的等級關係，其次為西歐與東北亞；在非洲、中東和亞洲其他地區，則幾乎不構成等級制。在具體表現上，西歐安全依賴與經濟自主並存，東北亞安全盟約與經濟依存交錯，而在加勒比海甚至出現美國直接軍事干預的案例（如 1965 年多明尼加危機）（Lake, 2009, pp. 82-92）。至此，國際權威大小與國際等級制高低呈現正相關的論點得到驗證，主權在國際實態下並非不可分割。

第四章探討主導國如何運用並維持其權威，以及這種權威關係如何影響主導國行為。首先，主導國必須為附屬國提供有價值的政治秩序；其次，紀律行動是維護秩序的必要組成，主導國必須對違反規則者進行規訓（discipline）；第三，為使附屬國信任並自願讓渡主權，主導國也必須證明其不會濫用權威。研究發現，美國顯著傾向於介入涉及其附屬國的國際危



機，表明其願意為保護附屬國而承擔成本；對於違反紀律者，美國也頻繁干預，遏制對其區域權威的挑戰（如於加勒比海所見）；美國亦藉由民主制度使政策透明化，以及發出奉行多邊主義的昂貴訊號（costly signals），來實現自我網綁（self-binding）。這種自我約束行為對傳統理論來說是「反常」的，但在權威視角下則能被解釋（Lake, 2009, pp. 93-132）。總體而言，維持秩序雖有成本（軍事部署、經濟援助等），但得以換取盟友支持和訂立國際規則的主導權，在精巧的操作下，對主導國可謂是合算的買賣（Lake, 2009, pp. 132-137）。

第五章從附屬國的角度分析國際等級制如何影響其行為，並進一步挑戰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表明，附屬國在國防上的開支顯著少於非附屬國，代表安全保障可藉由主權讓渡實現，進而將資源轉移到其他領域——此與均勢理論（balance of power）對國家權力制衡的預測相悖。附屬國也更傾向開放其經濟進行國際貿易和投資，因為主導國提供的政治秩序降低了貿易風險。在美國等級制的案例當中，附屬國受到鼓勵，遵守主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此外，儘管在傳統國關理論中難以解釋，附屬國傾向追隨主導國領導的戰時聯軍，展現「象徵性服從」（symbolic obedience）。雖有強烈的搭便車誘因，戰爭仍構成附屬國透過效忠主導國，以鞏固並再生產有利

於自身之政治秩序的關鍵契機。同樣地，縱使放棄與敵對於主導國的第三方結盟將帶來機會成本，附屬國得以在與他國發生衝突時，獲得主導國的保護（Lake, 2009, pp. 138-174）。

第三至五章共同昭示國際等級制存在且具有重要影響的實證證據。國際等級制塑造了主導國和附屬國的行為模式，挑戰了傳統國關理論的自助、均勢和主權不可分割等核心假設。附屬國透過讓渡部分主權，換取安全保障和經濟利益；主導國則為維持其權威，承擔維持秩序的成本並自我約束。

肆、關照世局

在結論環節，作者重申國家間的等級狀態確實存在，世界並非處於霍布斯式（Hobbesian）自然狀態。無政府狀態與等級制構成一個連續光譜，國際關係因此是一種混合型社會。國際權威的存在緩和了安全與權力的鬥爭，改變了國家間的互動。附屬國不再單純依賴自助，而是讓渡部分主權，透過契約向主導國尋求保護、合作與對外衝突的解決。國家並不總是制衡，有時會接受主導國的領導，這解釋了後冷戰時期全球為何沒有出現一個制衡美國的大聯合（Lake, 2009, pp. 175-176）。

然而，等級制絕非牢不可破，作者以中國崛起與伊拉克戰爭為例，說明等級制的脆弱性。對於中國，雷克認為美國可憑藉權威而非強制力，將包括



中國在內的潛在競爭者整合進由其領導的秩序，如同過去在歐洲與東亞積累的成功經驗那般。中國可能尋求自己的附屬國，美國的課題在於其脆弱權威能否在短中期內維持。另一方面，雷克批評美國出兵伊拉克是一種「越界」(overreach)：未經廣泛共識便推翻一個主權國家，不僅違背自我約束原則，也侵蝕盟友與附屬國信任，使其在組建聯盟與應對挑戰時付出更大成本。當主導國行為任性、缺乏契約上的自我約束時，附屬國的信任便會動搖，甚至尋求替代性安全或經濟安排。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的權威受損已在多個層面顯現(Lake, 2009, pp. 181-186)。

雷克憂慮等級制交換基礎的可能崩解，並建議美國應重建與附屬國的契約基礎，透過多邊規範化行動恢復正當性與可信度。美國等級制的時代尚未結束，但國際權威業已相當脆弱，美國必須做回一個「謙虛的」國家，擁抱多邊主義戰略。唯有在附屬國可接受的範圍內行事，避免被視為帝國主義強權，美國方能持續其權威(Lake, 2009, pp. 186-189)。⁴

伍、讀後小感

(一) 批評與前瞻

⁴ 由此可見，雷克絕不樂見川普諸多單邊主義行動、對盟友的榨取、對國際秩序的破壞作為，這些都嚴重減損了美國的國際權威。在 2025 年 5 月 16 日受邀至臺大社科院為「永續

本書敢於揭露無政府狀態之外國際等級制的存在，是國際關係學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其框架與方法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如中文版譯者高婉妮所指出，本書理論有三點問題：(1)雷克否定「國家自助」命題，主張附屬國自願放棄部分主權以換取安全庇護，此舉似乎推翻了安全最大化的論點。但嚴格來說，附屬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自身安全，只是手段更加靈活，因而未必真正超越「自助」假設。(2)雷克以「權威」說明「等級」，卻未對「等級制」給出明確定義，而「關係型」概念也難以客觀衡量。(3)書中案例選擇偏狹，僅限於 1950-2000 年的美國對外關係，且聚焦於安全與經濟領域，所用指標仍需更廣泛的驗證(高婉妮譯，2013，頁 VII-VIII)。其次，其他書評也指出：雷克過度關注美國與西方，過度以國家為中心，且未能回答國家為何會挑戰等級秩序或霸權國。更進一步，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早已不受「無政府狀態熱」(anarchy fever)束縛，長期將國際關係視為等級結構，因此雷克並非先驅。亦有評論認為他過度強調等級結構的「協商一致性」，反而可能「將權力從等式上移除」，因而產生令人不安的規範性影響(Barnett, 2010;

發展的王道途徑」論壇進行主題演講時，他深切表達了對當前世局走向「深層對抗」(deep contestations)的擔憂(雷克，2025)。



Kochanski, 2012; Taş Yetim, 2021)。以上批評部分集中於概念定義的清晰度、變項與指標的適切性，以及案例範圍的局限；另一些帶有後實證色彩的分析，則跨足本體論層面，挑戰雷克的理論基礎。這些批評雖未必削弱理論本身的價值，卻揭示了它在外延與適用性上的局限，也為後續研究指明方向，特別是在案例拓展上展現豐富潛力。

筆者認為，作者既然以物質利益與理性自利為基礎建構等級制理論，便更難迴避集體行動理論中的搭便車問題，不能僅以附屬國象徵性服從的實存將其輕輕放下。畢竟，搭便車行為增加霸權維繫秩序的成本，常被視為霸權衰退的重要因素。雷克自己則指出，等級制理論中尚未處理的是中間人（intermediaries）的作用，或者說是附屬國中一些個體的作用，這將是研究計畫中重要的下一步（Lake, 2009, pp. 179-180）。無論如何，在方法論與理論框架上，雷克都為國際關係學界提供了創新的貢獻。*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打破了無政府假設的單一敘事，將等級制納入國際關係的核心視野，並提出可操作的分析架構。在解釋戰後美國主導秩序方面，該理論尤具說服力，也帶動了後續相關研究的增加。雷克借用契約理論與可分割主權的觀點，更新了僵化的無政府假設，並提供理解帝國、勢力範圍、經濟區、保護國等多樣現象的新工

具。這不僅拓展了對前現代與非西伐利亞體系的研究方向，也為探討國際組織、超國家組織乃至全球治理開闢新的路徑。

（二）對話「歷史與國關」

本書雖以當代美國及其盟友為主要觀察對象，然其理論適用性絕不就此止步。從「歷史與國關」的視角來看，雷克以關係型權威建構的等級制模型，提供了一套跨時跨域的分析工具，能幫助我們比較不同行為者、文明圈與等級制安排。鑑於主權國家體系只是近代產物，歷史上其實存在多樣的等級秩序。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便能套用安全與經濟雙軸來解釋——宗藩圍繞「禮」展開互動，以軍事庇護（如「興滅繼絕」）與經濟特權作為支撐。其他諸如中古歐洲的封建體系、鄂圖曼帝國對附庸的經營，皆可作為雷克理論的試驗場。我們可藉由這些歷史案例，檢驗互惠邏輯是否具普遍性，或呈現跨時變化。雖然操作指標需因地制宜，但安全與經濟依舊作為物質基礎的兩個最重要維度。

需要指出的是，國關領域對東亞等級制的研究多聚焦漢、唐、明、清這樣的大一統時期，探索其與朝鮮、越南等外藩的互動。相比之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被邊緣化，甚至被簡化為「無政府狀態」的試驗場，以等級制為出發點的研究少之又少。其實，在大一統崩解到重新建構秩序的過程中，等級制理論仍有檢驗空間。舉



例而言，黃巢亂後歷經五代十國、直迄宋遼澶淵和議的百餘年歷史，既涉及外部藩屬，也存在內部封貢關係的不斷變動，正可測試等級制在秩序重建中的解釋力。

進一步說，不同文明對等級制正當性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雷克以安全與經濟利益為核心，未必涵蓋所有文化脈絡。雖然他承認規範與身分能鞏固秩序，但分析重心仍落在物質交換與制度安排上，可能忽略文化、歷史記憶與價值觀在塑造服從意願上的作用。我們既可將雷克理論套入東亞，也可放諸更廣泛的世界歷史，達到「以古鑑今」的目的。藉由比較不同時域的等級模式，理論的適用性得以擴展。在當代國際關係中，這一框架同樣有助於解析美中競逐，評估不同等級模式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並為未來國際秩序的演變提供啟發。



陸、參考文獻

唐欣偉 (2014)。檢驗雷克的國際層級論與福山的國家起源論：夏朝個案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15(3)，117-150。

陳欣之 (2007)。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問題與研究，46(2)，23-52。

雷克 (Lake, D. A.) (2013)。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 (高婉妮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09) [Lake, D. A. (2013).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N. Gao, Tran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9)]

雷克 (Lake, D. A.) (2025)。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全球化、深層對抗與未來？〔主題演講〕。永續發展的王道途徑國際論壇，5 月 16 日，臺北。[Lake, D. A. (2025).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ization, Deep Contestations, and the Futur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Global Forum on 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 May 16, Taipei.]

Barnett, M. (2010). Reviewed Work: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David Lak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2(3), 912-914.

Kochanski, A. (2012). Book Review: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40(2), 391-392.

Lake, D. A. (200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aş Yetim, H. (2021).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ok Review). *Anadolu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21(2), 677-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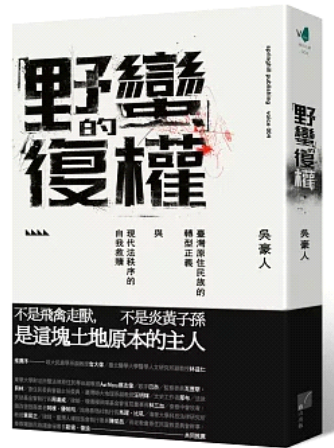
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政治哲學？

• 王宇杰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生

壹、前言

臺灣原住民作為生長在這塊土地超過百年之久的族群，歷經多代外來政權的統治，在這座島嶼上歷經了許許多多的辛酸血淚。本書的主旨，正是關注於在當代的社會下，「法律不正義」的議題。這項議題的背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當代社會下，法律可能反映的是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或社會多數群體的價值觀，然而，多數群體的價值觀，卻並非不可能與少數群體的規範有所扞格或衝突。當強調單一性與優位性的國家法律和政策，不斷地強加在少數群體的傳統規範上，少數民族傳統規範的生存空間，便可能不知不覺地被壓縮，最終使自身的傳統文化與規範被迫永久消失。這正是現今臺灣原住民族所經歷的悲慘困境。

如果我們更具體地從目前臺灣的法體系來看，不難發現多數熟悉的國家法律，是繼受（succession）於西方市民法（civil law）；反之，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多數僅停留在「習慣」（custom）層級，相較於國家法劣勢許多。舉例而言，民法第一條便規定：



書名：「野蠻」的復權：臺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

作者：吳豪人

出版者：春山出版

年份：2019.05

頁數：320 pages

ISBN：9789869735933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可以看出國家法不只是在國家內取得單一的壟斷地位，在國家法的視野中，習慣只是低於國家法地位的補充性工具。

值得思考的是，較其他規範優位的國家法，一定是一個國家內「最佳的規範」嗎？在 2024 年，臺灣社會矚目的「113 憲判字第 8 號判決」裡，考察原住民族刑罰規範便成為鑑定我國死刑制度的思考方向，結果發現絕大多數原住民族的最嚴厲刑罰，係採取贖財和放逐等手段，極少採用死刑（黃丞儀，2024：3-6）。從這樣的思考可以看出，國家法是不是必然相較於其他的規範優越，似乎仍有待進一步討論。

建立在以上的背景脈絡，本書的作者吳豪人教授，即嘗試從法律史的角度先描繪出臺灣原住民在土地及自身規範，與國家法上的發展關係，論證從日治時代至今日，原住民族確實是居於國家法下的極度弱勢地位。接著，再從以上的困境與基礎出發，討論該採取什麼手段，才能讓長期被國家法打壓的原住民族傳統規範，步向日後「復權」的道路。

貳、本書問題意識與論點

本書的編排主要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主要的篇幅論述的正是聚焦於「原住民族」如何對抗「外來政權」的不公平對待。然而，在此部分之外，

作者亦以補述的方式，談論所謂「原住民族」與「原住民族」間對抗的議題。換言之，作者探討的是「弱勢者」與「弱勢者中的弱勢」在實質上處於何種關係，以及兩者之間。從作者的角度，應該抱持怎麼樣的態度，方能在「原住民族」對抗「外來政權」的主戰場較為有利？針對本書作者提出的問題意識與其解方探討，以下將分述之：

一、問題意識梳理與釐清

本書意圖解決的關鍵問題之背景，簡單來說，正是建立在外來殖民者統治下，對其傳統規範與生活模式的無盡剝削歷史。作者認為這就是外來統治者排除原住民族權利的一段歷史。在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府對於法人格的承認，仍存在高度侷限，尚未及於當今國際人權法底下廣泛承認生物學上的人，將原住民族排除在外。日本殖民政府主張，原住民族由於其行動不合乎於國家法的界限範圍，所以原住民族不具有法律上的「法人格」。因此，蕃人無法主張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原住民僅是地上物。這導致原住民族生活的山林和土地，直接被日本殖民政府劃歸為國有地，使得殖民政府取得開採山林的法律正當性。到了國民政府，儘管其不像日本殖民政府，不承認原住民族在憲法上的固有權利，但卻將原住民族視為「炎黃子孫」與「山胞」一步步地同化原住民族，無異是在侵略原住



民族的傳統規範，使其隨著時間一點一滴凋零（2019：40-48）。從這段歷史的考據要證成的問題核心基礎，體現臺灣原住民族在當今遭遇的困境，而這個困境乃是來自於外來者侵略與破壞，也因此本書解決的問題聚焦於化解此困境的解決途徑，藉此回復原住民族最初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原始權利，亦即：外來者對原住民族傳統規範與權利的破壞殆盡，原住民族該採取何種途徑回復自身權利？

此問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操作起來卻相當地困難。歷來的政府與專家學者均遭受挫折，也是為何原住民族至今仍尚未完全地達到復權的原因。接著，本針對這個核心問題說明存在那些解決途徑，以及在作者看來，為何多數的解決途徑「不可行」？

二、回應本書問題的歷來解決途徑與方案及其評析

（一）將原住民族傳統規範納入現行國家法中的物權法體系之下

傳統規範與現行國家法之間，其實存在競合關係。當原住民的行為同時觸犯國家法和傳統規範時，其適用關係為何？哪種規範優先適用？在現行臺灣社會下，作為政治上合法暴力、具備多數民主之正當性的國家法，顯然是唯一適用的選項。但承前所述，這樣的狀況已經導致對於原住民族的不平等與剝削，國家勢必需要考量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才能解決

不平等的再度發生。此處的不平等尤以「土地不正義」的議題最為明顯，因為土地正是環繞著原住民族生存權利的重要因素。然而，基於政策與立法的成本考量，要客製化立法政策實際上存在相當困難。當然，過往不是沒有原住民族的專法，最經典的一部法律非《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法》）莫屬。在作者看來，《原基法》現今成為一部僅能拿來供奉的法律，最多的功用僅為釋憲，原因不外乎是《原基法》的子法制定付之闕如，致使相關權利無法具體落實（2019：144）。

從而，我國的實定法（positive law）學者便嘗試將現行國家法與原住民族傳統規範進行「整合」。換言之，讓兩者不再處於對立關係，而是可處於合作與共存的地位上。然而，這樣天真的幻想在作者眼中實際上可能是一場災難。最關鍵的難處便是原住民族的習慣，有理由被整併到國家法底下？換言之，國家法與原住民族的習慣法，不應有孰優孰劣的認定，但嘗試將習慣法納入現行國家法體系，似乎隱含著國家法較優，原住民族傳統習慣法較劣的歧視（discrimination）。再者，當習慣法被置於國家法底下時，國家法在政治上也難保不會逐漸將其同化成，被多數人幻想較為美好的西方市民法體系。因此，作者認為，這個途徑既危險又不可行。



（二）現行原住民族自決法制的提出

原住民族曾經嘗試提出大膽與跳脫現行體制的自決法案，也就是說，原住民的傳統規範與現行國家法可以涇渭分明、分道揚鑣，亦即作者肯認的這段主張：

現代市民法上，「凡肯認習慣入法的法律帝國，都有殖民戰略的考量。」而既然出於殖民戰略，道德上當然缺乏正當性，法理上必然有致命破綻，因此理所當然被解殖、被揚棄。（2019：270）

但是，建立在這個理念上的解決途徑，政策與制度可行性會遭遇極大挑戰，特別是在立法的構想與概念上面，要與國家法明確劃分有相當的難度。舉例而言，《太魯閣族自治法》的設計理念被類似於太魯閣族的憲法，但在其憲政體制設計下，卻沿襲《中華民國憲法》的雙首長制以及西方市民法下三權分立的產物。相對的，在偏向初步、局部的立法提案上，則是備受作者肯定。作者舉出司馬庫斯部落的法制度，係以環境保護作為立法目的，對部落內的土地進行相當程度的管制，因而和現行民法提升經濟利益的目的有所區隔，獲得不受國家法拘束的空間與道德正當性。

（三）依照生產力決定所有權歸屬作為原住民族土地正義的可能性

如同前述，土地正義一直是回復原住民權利的關鍵要素。據此，作者

提出依照生產力高低，認為生產力最高者，可交由部落會議決定是否採用民法所有權的排他性；次低者則依照原住民傳統規範，採行「總有制」；較低者則採取嘗試設定數個新的民法物權；最低者，則劃歸為無主物，歸國家管理。

申言之，這樣的解方或許與前述第一種的解決途徑類似，皆是將想法置於國家法的現行框架上，但此處的主張卻嘗試給予更多原住民自由決定其土地利用的空間，應當能促進原住民族的土地正義。

（四）轉型正義的實踐謬誤

現行國家與臺灣社會持續倡導的修復式正義，已存在於原住民的傳統規範許久。同時，當原住民族在面對主流社會與外來政權的「霸凌」時，並不選擇以仇恨性語言和暴力行動反抗，儼然體現出一種新的修復式正義。弔詭的是，近年國家法卻大力倡議修復式司法，至今卻仍然在原住民復權與轉型正義上裹足不前，持續剝削原住民族傳統規範生存空間，因此，作者批評現行掌握國家法的政府，形同剽竊他人制度與理念的海盜。

三、原原對抗的困境

此部分的補述，作者主要是從平埔族的西拉雅族正名困境說起，即現行原住民欺負原住民的困境。西拉雅族人長期以來希望可以正名為法定



的原住民，但基於「資源稀少性」的根本假設，現行的原民會與掌握原住民資源的多數原住民族，反對這樣的主張。作者針對這樣的困境，認為現行多數原住民族應當放下這樣的顧慮與擔憂，當西拉雅族也正名加入原住民族社群，可以讓社群內獲得更多與更團結的力量，讓原漢對抗的主戰場，提供更強大的助力。

四、結論：原漢對抗下的復權之路提點

社會契約論被視為是現行西方市民法體系的重要基礎理念，其認為社會規範係由一群理性的平均人，為了脫離自然狀態而據以形成社會契約，並以社會契約對高於平均以上之人與國家進行約束。然而，此種平均人底下之人，卻往往成為社會上被忽視和排除的一群人，這群人正是現行原住民族的處境。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現行市民法或社會契約形同侵害原住民族權利的殖民工具，對此的回應正是解殖(decolonization)。在這樣的觀點下，原住民的法律史或許不必然從屬於臺灣法律史的學科底下。

在解殖的過程，作者從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少數群體的內部審議反省，認為少數族群內部的審議可以在多數社會下，持續地讓公共意見保留多元性。但在現行原住民族社群中，這樣的內部審議卻是已經屬於

少數的原住民族中的少數，原住民族的復權之路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參、評論與反思

本書針對現行法體制，原住民法規範以及國家法競合議題進行深度反思，更據以梳理出此問題背後的龐大脈絡。對此，在原住民法與國家法競合的議題上，本文從兩個方向提出思考。首先，若延續吳豪人教授的批判性觀點，其具體落實與政策可行性，是否仍有待商榷？另一方面，若不完全採取本書的觀點，批判國家法的傲慢，是不是可以藉由國家法對前面向的可行性提供助力，藉此提升原住民權利？以下評論的第一個部分要探討的是有關本書觀點，具體落實下的政策可行性，第二部分則是思考，若本書觀點有政策可行性的阻礙，能否換個角度，藉由國家法的導入，借力使力來達到復權的目標。

一、有關可行性的具體探討

針對吳豪人教授的主張，王曉丹(2024)便指出其觀點存在的問題，也就是有關具體實踐的可行性：首先，透過在原住民規範中實現全面解殖，仍仰賴立法的層次，但一旦進入立法的階段，便需要有政治的著力點，亦即需要說服以漢人為多數的國會議員，接受原住民族與現行國家法互不隸屬的事實，對於代表國家法的這些多數議員而言，勢必有相當難度，因而在政策合法化仍有一定阻



礙。再者，原住民族在解殖的過程中，勢必會觸動漢人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可能與現行的國家法全然切割開來，必須經過與漢人的談判與協商。

王曉丹教授的擔憂並非是沒有道理，舉例而言，在第一個批判上面，官曉薇（2019）針對有關婚姻平權的研究，發現法律動員的主戰場仍然在立法。這或許扣住王教授的第二個質疑，若現行原住民族的復權，是有可能觸碰到利用國家法的法律動員，那麼考慮立法的途徑，就相當重要。

換言之，王曉丹教授的二個想法，其實體現出民主改革下「制度鎖定」的難題。制度鎖定指的是制度改革時，制度受到層層保護，進而難以變革。當意圖改變一個被鎖定的制度，勢必有賴多數決、集體共識與較高難度的決策程序（蘇彥圖，2017：119）。面對制度鎖定的政治難題，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則具有不同的回應方式。鷹派可能選擇爭取到多數決的地位，但鴿派則認為可以透過合作與談判。

從上述的內容，可以得知有關原住民族中國家法的解殖，勢必須思考現實可行性的相關回應。筆者認為有三個可以提供讀者思考的方向，前兩項主要從公共政策發展出來，另一項則是有關於重新思考國家法的功能。

首先，筆者認為可以透過公共政策中的多元流程模式，嘗試將政治的著力點連結到「議程設定」理論上。

此理論指出當政策的問題流、政策流與政治流一旦匯流，政策機會窗就有可能被打開，此時願意投資自身精力與資源或有心關注此項政策的「政策企業家」，就有可能把握機會投注資源，將這項政策推進政策議程中，進而促使此項政策與改革的達成（丘昌泰，2022：117-118）。

本文認為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在原住民族復權的政策上，問題流的發生可能是多數的漢人對原住民文化有所流失的認識；政治流可能是發生在原住民族形成一股穩固的力量，能夠對於政治人物行使撤回自身國民主權的時候；政策流則有可能是匯集於內部原住民的共識，乃至於多數漢人族群間的共識。當然這僅是初步個人的想法，但上述的說明能輔助我們釐清在期待政策窗開啟（也就是達到原住民族「解殖」的最終理念）前，可以依循和努力的方向。

第二個方向是公共政策中「漸進主義」的政策模式，這主要是用來克服政策一步到位，既有勢力阻撓的現實困境。漸進主義指出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完全理性，所有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上做小幅度的調整（丘昌泰：314）。從漸進主義的想法中，或許可以嘗試思考不與現行制度完全脫鉤的可能性，亦即認為爭取原住民族權利與政策一步步推進較佳。那麼，利用現行國家法這項工具的借力使力和努力，在漸進主義下便顯得有機可



循，這也是筆者下一節想延續探索的議題。

二、現行法的借力使力，有可能嗎？

臺東縣知本地區卡大地布的光電案件，為 2022 年臺灣社會矚目的原住民族訴訟案件。王曉丹（2023：45）從中觀察，卻發現當原住民族在採取法律動員時，尚未引進國家訴訟法時，部落內的贊成與反對的雙方面臨著彼此的「道德指控」，贊成光電開發的一方，被認為是在追求經濟利益下破壞傳統道德的人，而反對的一方則蒙受阻礙經濟發展的指責。但當訴訟程序的導入之後，族人間的道德有逐漸下降的情況。因為法院在此案件中，審理的部分多數是有關光電開發程序的正當性。這促使族人指責的對象從部落裡的彼此，轉向原民會與臺東縣政府，判決更促使案件爭議的視野提高到國際人權法上面。

從這樣的觀察，國家法可能也有另一種的面向，並非全然是單一的剝削/被剝削以及殖民/解殖的關係，甚至有改善吳豪人教授提到的原住民族團結性困境之可能。

統整上述的三個方向與論點，筆者認為在前期的階段，也許能將相關復權的策略定位在漸進主義之上，具體來說可以利用現行法或國家法當作借力使力的工具，推進國家法讓渡更多的空間給原住民族的傳統規範。於此同時，繼續在開啟政策窗的方向上努力。當政策窗開啟時，便將原住

民族的解殖與復權擺上政策議程，拋棄過往國家法或市民法的拘束，邁向本書主張的全面解殖之路。

肆、結論

在吳教授的書籍中，從法律史的角度論證了現行市民法與原住民族傳統規範難以共存的關鍵論點，因此要做的工作正是解殖。但這樣的論點可能過於二分性，也必須考慮更多可行性的議題。因此，筆者的工作，嘗試從現行學者批判本書的論點出發，再以公共政策的理論，初步去提出具體的落實方向。針對有關缺乏政治著力點的批評，本文聯想到多元流程模式理論，透過套用理論的概念，釐清政策窗的開啟的三個努力：政治流、政策流與問題流未來需要努力的地方。另一方面，筆者也反思國家法的角色。透過公共政策中的漸進主義模型概念，以及卡大地布的訴訟案中的經驗，認為原住民族或許能藉由國家法借力使力，跨出復權的第一步，再以相關社群的共同努力，嘗試觸及政策窗開啟，讓有心的政策企業家有投入資源的機會，成功邁向解殖與復權的終點站。



伍、參考文獻

王曉丹 (2023)。建構多重且有實踐力的主體－從知本光電案看卡大地布的法律動員如何促進原住民族自治？。臺灣民主季刊，20 (2)，29-76。

王曉丹 (2024)。法律解殖之路——原住民族的主權敘事重構與法律多元轉向。中研院法學期刊，35 期，頁 1-67。

丘昌泰 (2022)。公共政策，高雄市：巨流

官曉薇 (2019)。婚姻平權與法律動員－釋字第 748 號解釋前之立法與訴訟行動。臺灣民主季刊，16 (1)，1-44。

黃丞儀 (2024)。113 憲判字第 8 號黃丞儀研究員 1130417 專家諮詢意見書，4 月，<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51689>。

彌爾《論自由》與近代自由主義發展

• 邱敏碩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壹、前言

本文探討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中對近代自由主義之理論貢獻，並將其思想置於自由主義發展史之脈絡中加以分析。彌爾承繼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主的精神，卻批判洛克等自然權利論者的先驗假設，主張真理需經由不斷辯證與經驗檢驗而生成。彌爾指出，即便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人的輿論亦可能構成「社會性暴政」¹，壓制異端思想與生活方式，因而強調保障反面意見在思想市場中的流通。《論自由》批判當時基督教在形式上之教條化，亦肯定多元宗教詮釋對促進思想交流之價值存在，彌爾關於「高級快樂」的觀念超越邊沁的功利主義框架，奠基了「成長性個人主義」²的理論基礎，引入積極自由與社會責任觀，揭示了當代自由主義之發展途徑。

同時，彌爾之理性討論模型雖忽略了權力不平等與資訊操縱的現實



書 名：論自由

作 者：John Stuart Mill

譯 者：孟凡禮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年 份：2025.03.28

頁 數：224 pages

ISBN：9786264231282

¹ 或可稱多數暴政，視為多數人統治下所產生之境況，少數群體的福利或權利被忽略。

² 追求自由與權利的同時，也注重自我個體的價值提升。



限制，但其防範多數暴政與多元寬容之念想，對現代數位言論治理與民主討論仍具相當性之警示意義。《論自由》批判當時基督教在形式上之教條化，亦肯定多元宗教詮釋對促進思想交流之價值存在，彌爾關於「高級快樂」的觀念超越邊沁的功利主義框架，奠基了「成長性個人主義」的理論基礎，引入積極自由與社會責任觀，揭示了當代自由主義之發展途徑。同時，彌爾之理性討論模型雖忽略了權力不平等與資訊操縱的現實限制，但其防範多數暴政與多元寬容之念想，對現代數位言論治理與民主討論仍具相當性之警示意義。

貳、彌爾《論自由》之背景脈絡

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作為繼洛克《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Locke&Abrams, 1967）後又一部關於個人與群體關係的政治哲學經典，深刻影響了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近代自由觀念的源流可追溯至古希臘斯多亞學派的自然法思想，經中世紀演化，至 17 世紀英國大憲章時與自由權利的制度化結合，並在宗教改革後因個人無限價值與信仰自由的興起而生成抽象自由概念。洛克藉「社會契約論」指出政府的正當性源於個人權利的授予，然而彌爾所屬的經驗主義派並不接受自

然權利的先驗假設，而主張真理來自經驗辯證，無人可壟斷真理。

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政治體制已臻完備之背景脈絡之下，彌爾關注之問題焦點不在政府合法性構建，而在於當民主制度確立後，是否仍存在對個人自由之威脅。彌爾觀察到，公眾輿論與道德壓力往往能排斥不遵循社會習俗與主流觀點的少數。這種排斥即便不依賴法律與國家暴力，亦足以扼殺思想、行動與言論自由。於是，《論自由》中多次討論基督教觀對自由的限制（Berlin, 1969），批評當時的基督教未能內化為推動人類道德進步的力量，而只是對基督教的經文與儀式的習慣性尊崇，以單一宗教範式規訓人類情感，並排斥世俗倫理的補充。相比之下，他認為其他宗教的多元詮釋更能容納異議，促進不同觀點交流與辯證，標新立異，能引發更多質疑，也更能包容不同的聲音，形成不同的解釋。故而，其他宗教之散播可能更廣。

參、《論自由》之觀點與價值

彌爾的核心論點是反面意見之重要性，其指出，妄言「絕對正確」的危險不在於是個人對某信條之堅定信仰，而是在於以此斷定他人是非並剝奪其表達反面意見之機會；任何觀點，即便再正確，若不能持續經受充分且無畏的討論，將成僵死的教條。真理須在相互衝突的理由公平較



量中被檢驗，理性的保證在於所有反對意見都能被完全回應，並舉出許多過去的歷史經驗。其中，就包括了蘇格拉底，《論自由》裡也提到：「蘇格拉底被處死了，但其光輝照遍整個人類的蒼穹」³，蘇格拉底的死亡是要容納不同意見的歷史鐵證。彌爾不斷強調，尋求真理的過程要不斷吸收所謂的反面意見，這一思想與後來法蘭克福學派馬庫色（Marcuse, 1964）、阿多諾、霍克海默提出的「否證法則」有相似性（Horkheimer, et al. 2002），即透過假設事物不是什麼來質疑其本質，並在衝突中尋找共同點與平衡點，批判理論有所謂的「否證法則」，是對辯證的內在假設，用來強調某物的特質，應先假設事物「不是」什麼，不單純以他們是甚麼做辨識，馬庫色希望藉此打破被視為思想基石的古典邏輯，提供不同的思考模式，去質疑既存的事物本質究竟為何？而當某物變成不是甚麼時，去思考其本質發生激進改變的可能，真理是兩組衝突概念的公平較量，並在其中尋找共同點、平衡點，且吸收他人的意見會成為信賴的堅固基礎。然而，包容或吸收反面、相異意見是否真能讓世界共善、共好，使人類更加接近真理？關於這點，我認為，彌爾不否認，彌爾雖不認為自由討論能解決所有問題，亦承認言論可能宗派化，他堅信只要

願意傾聽各方意見，真理與社會進步仍有希望，關於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中國近代思想家嚴復以「群己權界」概念呼應（1998, pp. 17-64），強調劃分政府權限以保障個人權利，此概念認為，一個社會的權力，應是基於一種有規則的正當性權力，透過劃分政府的權界，尊重並保障每個人的權利。

肆、自由主義思想之發展與彌爾

自由主義作為與社會主義對立的思想傳統，重視個體發展與自我實現的價值，在工業革命與市場資本主義興起之際，自由主義者挑戰君權神授下的絕對王權，推崇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運作，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⁴（Invisible hand）理論（Smith, et al. 2003）與李嘉圖的工資鐵律（Ricardo, 2015）體現了古典自由主義對市場自我調節的信念，自由主義的核心包括個人主義、自由、理性主義、正義與寬容：個人主義將個人置於群體之上，古典自由主義與新右派強調自利與自我依靠（Steiner, 2017），而當代自由主義則主張發展性個人主義，注重個人成長高於利益滿足；自由被古典自由主義視為天賦人權，當代自由主義則認為自由是實現潛能的前提。古典自由主義視國家

³蘇格拉底被指控腐壞年輕人的思想以及不相信神靈。

⁴其概念指涉在無干預的情境下，市場可進行自我調節。



為「必要之惡」⁵，主張限制其干預，重視公民社會作為自由領域，並偏重消極自由——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其理念源於自然權利、功利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分別由洛克、邊沁與彌爾、亞當·斯密與史賓賽所代表。進入二十世紀，當代自由主義在面對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與市場失靈時，發展出修正式自由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在機會平等基礎上推行社會福利並適度管理經濟。彌爾在此過渡中具有關鍵意義，他超越邊沁將行動快樂二分化的模式，提出高級快樂的觀念，成為成長性個人主義的先驅，認為自由應引導人追求自我實現而非僅滿足私慾，並在古典自由的基礎上引入積極自由與社會責任（Burns & Hart, 1982），認為國家有義務改善弱勢處境以促進公平競爭，彌爾所倡導的寬容與多元，使自由不再只是免於干預的狀態，更成為保障思想流通與促進個體全面發展。

伍、結語

彌爾的思想雖存在對理性討論過度樂觀的假設，忽略了權力不平等與資訊操縱的現實，但其警惕多數暴政與捍衛異端意見的理念，仍對當今民主、數位時代的言論治理具有深刻

啟示意義，《論自由》展現的自由觀既根基於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又突破其侷限，將個人自主、多元寬容與積極條件融為一體，為現代自由主義奠定了持久的理論基礎。別於集體性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象徵著「個體」發展與成就自身的價值觀，當代亞洲的儒家文化對於群體、宗族、同儕的影響，使亞洲文化從學校至職場充斥著「壓抑」之氛圍，魯迅寫「狂人日記」某部分也是在批判儒家文化所塑造出的奴役性，台積電獨佔晶圓代工市場，成為世界之最的背景脈絡似乎也脫離不了高壓式之管理文化。觀《論自由》在反思當今社會文化，不禁產生疑問，為何東西方的文明發展軌跡會出現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兩個路徑，另外，當今世界興起之右派政治、右翼思想是更充實自由意志還是在破壞自由意志，值得現代公民進行反思。

⁵ 國家力量展現本身是惡的，但是它提供了秩序與法律，使個人免受進入無政府的暴力狀態。



陸、參考資料

彌爾 (Mill, J. S.), 孟凡禮譯,《論自由》(台中:五南,2025)。

嚴復, & 林載爵. (1998). 群己權界論 / [嚴復著]; 林載爵編.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史密斯, 黎冷, & Smith, A. (2003). 國富論 /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 黎冷編譯 (初版). 華立文化出版.

Locke, J., & Abrams, P. (1967). Two tracts on government: John Locke/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 and translation by Philip Abrams. Cambridge U.P.Bentham,

J., Burns, J. H., & Hart, H. L. A.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 Jeremy Bentham; edited by J.H. Burns and H.L.A. Hart. Methuen.

Steiner, H. (2017). Individual liberty. In Liberty reader (pp. 123-140). Routledge.

Berlin, I.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 by Sir Isaiah Ber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kheimer, M., Adorno, T. W., & Schmid Noerr, G. (200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edited by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ardo, D. (2015).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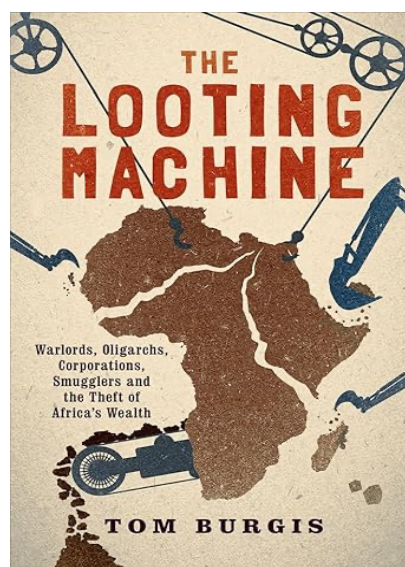
The Looting Machine: Warlords, Oligarchs, Corporations, Smugglers, and the Theft of Africa's Wealth

• 吳可新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國際關係組學生

I. Introduction

Tom Burgis, 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currently with The Guardian and previously with the Financial Times, has dedicated his career to exposing corruption scandals and shedding light on conflict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During his 9 years of reporting in Africa for the Financial Times, he tracked the trails of dirty money from Africa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and in his book *The Looting Machine: Warlords, Tycoons, Smugglers and the Systematic Theft of Africa's Wealth*, Burgis explore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in Africa's wealth.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holds 30% of the world's natural minerals, possessing 7.5% of global oil, 40% of gold, and up to 90% of platinum reserves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4). These resources are necessary components in our everyday electronics, such as computers and phones, making Africa



書 名：The Looting Machine:
Warlords, Oligarchs,
Corporations, Smugglers, and
the Theft of Africa's Wealth

作 者：Tom Burgis

出版者：Hachette Book Group

年 份：2016

頁 數：352 pages

ISBN：9781610394390



an important link in our global supply chains.

Despite this resource abundance,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the highest rates of extreme poverty among all the other continents in the world. In Sub-Saharan Africa, roughly 46% of the population lived in extreme poverty as of 2024, meaning about 440 million individuals in the region were surviving on incomes below the extreme poverty line (Lønborg et al., 2025). the highest rates of extreme poverty among all the other continents in the world. In Sub-Saharan Africa, roughly 46% of the population lived in extreme poverty as of 2024, meaning about 440 million individuals in the region were surviving on incomes below the extreme poverty line (Lønborg et al., 2025) .

Why does this paradox exist? Burgis argues that the situation in Africa is not merely an African problem, but a global problem. Through case studies based on his reporting and research, the author illustrates how elites, corporations, and foreign companies exploit Africa's resources, enriching a few while impoverishing the majority.

II. Summary

In this book, Burgis (2016) highlights the resource curse theory, which suggests that countries often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tend to perform worse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and are prone to corruption and conflict. Through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several resource-rich African countries, Burgis demonstrates how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can become a source of exploitation and inequality rather than prosperity.

Angola is presented as one of the prime examples of the resource curse in Chapter 1, "Futungo Inc." Following years of civil war in Angola, the ruling MPLA party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converted wartime oil revenues into an extensive patronage network under President 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and his daughter Isabel dos Santos (Burgis, 2016). This patronage network ensured that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was managed by a small number of elites, with the state oil company, Sonangol, operating at the center. The tight network channeled billions of petrodollars into secretive and opaque deals while most citizens remained in poverty (Burgis, 2016) .



Burgis uses the example of Angola to showcase how resource wealth can indirectly strengthen authoritarian rule rather than development, as the country becomes a state where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control become inseparable. The book presents another exampl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Coltan, cobalt, and copper are often mined in conflict zones wher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re widespread (Burgis, 2016).

Still, they also serve as key components in modern technology. Burgis's investigation reveals how Congolese warlords, local political elites, and foreign actors—including Israeli businessman Dan Gertler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re involved in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exploitation. Gertler's close ties with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allowed him to secure mining rights at extremely low prices, whil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use offshore operations to conceal profits (Burgis, 2016). Som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ed the Dodd-Frank Act, requiring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lose if they

used any conflict materials from the DRC or any related countries.

Yet, some consider the Dodd-Frank Act a failure as it didn't resolve increased violence and job losses in the area (Burgis, 2016).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the DRC embodies the functions of a looting machine, where resources flow through shady deals, offshore entities, and private forces. This system also illustrates how the global economy benefits from the instability and corruption that persist in Africa. Burgis (2016) also mentions other cases, such as the Niger Delta region of Nigeria, where oil fuels corrup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illions of dollars intended for local development are lost through bribery and offshore laundering schemes, involv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like Shell and Halliburton in this harmful cycle. While previous cases expose how weak states are vulnerable to resource-driven corruption, Burgis's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 demonstrates that even Africa's strong democracies are not exempt from these patterns.

In Chapter 9 titled "Black Gold," Burgis argues that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s democracy did not contribute to dismantling the deep inequalities



rooted in its mining-based economy. Despite the end of white minority rule, the structures of extractive capitalism remain intact. The Marikana massacre of 2012, in which the police opened fire on striking platinum miners demanding better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serves as a stark reminder of this issue. Burgis (2016) argues that the resource curse is structural and global, not limited by race, ideology, or political system. Even under democratic rule, resource dependency can fuel inequality, demonstrating how easily exploitation adjusts to new political systems.

While Burgis has identified many foreign actors and companie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looting machine system throughout his case studies, Burgis highlights one country that has expanded its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throughout the years in Afric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entities such as the Queensway Group and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CIF), these Chinese state-linked investors offer infrastructure and loans in return for access to African oil and minerals. Guinea's former mining minister, Mahmoud Thiam, has brokered major mining deals with the Queensway group and other Chinese

state-affiliated investors in exchange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urgis, 2016). Burgis maintains that these types of transactions reveal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the looting machine, where corruption is disguised as foreign investment. He describes the involvement of these foreign actors as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s foreign countries pursue economic dependency throug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loitative deals.

III. Analysi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resource curse and the looting machine manifested, I analyze the issue on two levels: the dynamics of Africa's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and the role of foreign actors. Through a political science lens and perspective, it can provid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driving exploitation.

A. Africa's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frica's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landscape have facilitat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ooting machine. A look into Africa's colonial past can provide valuable 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certain African countries. Colonial powers introduced a monetary system that incentivized local chiefs through tax ownership and employed a "divide and rule" strategy that favored certain groups. These colonial practices created political divisions that fostered patronage systems and ethnic clientelism (Mulinge & Lesetedi, 1998). After independence, many African leaders adopted authoritarian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onial period, such as centralizing power and facilitating personalized rent-seeking behavior. This can be seen in Angola's establishment of Sonangol and in other African cases highlighted throughout the book.

A key characteristic that has facilitated the looting machine system within Africa, which is also mentioned within the book, is the crony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a system where economic success often depends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rather than pure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prompts businesses to prioritize securing government favors and short-sighted investments, thereby exacerb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lbert et al., 2021). We see th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and Nigeria.

Individuals use personal ties to political leaders in securing mining deals and better access to prices, and companies benefit from weak oversight. This system of crony capitalism has fueled ongoing exploitation. Actors within this system invest in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influence to manipulate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ir favor.

Another characteristic is neopatrimonial clientelism, which describes when political authority is personalized and state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 patronage networks (van de Walle, 2007). This has become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African politics. In many cases discussed by Burgis, political leaders maintain power through elite patronage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often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among ruling elites and weakening state capacity. Moreover, a democracy is not always able to eliminate clientelist behavior.

In many African countries, neopatrimonial leaders have created "façade democracies"—hybrid regimes that employ democratic mechanisms while maintaining authoritarian control—or "illiberal



democracies,” where undemocratic practices are hidden beneath formall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van de Walle, 2007). Overcoming these structures requires the responsible manage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which helps explain why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did not dismantle the inequalities rooted in its mining-based economy.

B. The Role of Foreign Actors

Burgis exposes many foreign figures and firms linked to Africa’s exploitation, and China was featured prominently throughout the book. For this reason, China is highlighted in my analysis of external actors in this section.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merged as a major foreign actor in Africa, driven by its non-interference policy and norm-shaping selective engagement. As Western aid and agreements are often conditional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human rights standards, China’s approach makes it attractive for African governments that want quick and unrestricted financing (Alden & Large, 2015).

Africa serves as a sour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market opportunity that fuel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return, China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state control,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rather than holding elections (Sun, 2016).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se personal connections (關係) to negotiate deals with African governments. In Angola, China offers loans to fund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return for oil. However, these projects have led to debt dependency in Angola, as well as a portion of funds ending up in the personal bank accounts of political elites instead of benefiting the population.

Under the liberalist school of thought, trade is expected to benefit all parties, yet neo-imperialism is an overarching theme in this book, showing the unequal power dynamics shaping Africa’s engagement with foreign actors. The Latecomer Advantage Theory argu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leverage their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to accelerate growth. One principle of this approach i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 which emphasizes developing industries aligned with a country’s factor endowments and suppor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state-led coordination (Lin, 2016).



In Africa, this means transforming its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into broa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re are latecomer advantages, there are also latecomer disadvantages. Many countries struggle in their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often dealing with lat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such as weak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transaction costs when building sustainable industries aligned with their factor endowments (Lin, 2016). Foreign actors play into this disadvantage, hindering Africa from turning its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in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exploitative system in plac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would require a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strong regulatory oversight, and risk assessment (Sun, 2016), and unfortunately, Africa is not considered a foreign policy priority for many of these foreign actors. As a result, these types of deals and partnerships, not only from China but also from other foreign actors, have reinforced the dynamics of the looting machine: dependency on foreign capital, vulnerability to corruption, and unsuccessful development.

IV.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weak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predatory external actors can transform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into political dysfunction and economic dependency across Africa, making the resource curse a reality. The book challenges assumptions about development and global integration, reflecting themes from Immanuel Wallerstein's World Systems Theory by demonstrating how core countries and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dominate the peripheral resource-rich African countries, making them vulnerable to exploitation.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o this book when assessing it from a purely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This book is written as a journalistic account, focusing on case-by-case examples through Burgis's investigative work. This approach introduces powerful stories but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how generalizable the findings are. Burgis adopt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wards liberalism and globalization, as is evident throughout the book.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externally aided development has also yielded positive outcomes for the continent.



Thus, exploring successful examples of FDI and foreign aid development can offer a more balanced view when reflecting on the insights of this book. Additionally,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15, with most of the content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from the years before its release. Therefore, some contents of the book may be considered "outdated"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esent international policies would need to be considered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discussed in the book.

Although the book is primarily written as a journalistic investigation and does not completely engage with politic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r academic applications, it still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real-life scenarios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an academic lens. For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contents within this book allow us to apply exist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ch as the resource curse theory, clientelism, neo-imperialism,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etc...

As one of Burgis's central arguments is that corruption operates in both directions,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that often frames corruption as a local issue driven by ethnic 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failures can be reconsidered. Recognizing this can help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not only in Africa but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The situation in Africa and the Looting Machine ultimately calls for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resource governance, showing us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Africa and its plac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that w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References

- Albert, O., Abada, I., & Adibe, R. (2021). Crony capitalism in Nigeria: The case of patronage funding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Power Sector Reform, 1999–2015.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48(170). <https://doi.org/10.1080/03056244.2021.1958309>
- Alden, C., & Large, D. (2015). On becoming a norms mak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orms 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in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21, 123–142.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5000028>
- Burgis, T. (2016). The looting machine: Warlords, oligarchs, corporations, smugglers, and the theft of Africa's wealth. Hachette Book Group.
- Gilberthorpe, E., & Papyrakis, E. (2015).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The resource curse at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2), 381–390. <https://doi.org/10.1016/j.exis.2015.02.008>
- Lin, J. Y. (2016). The latecom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scape from Poverty*, 43–67.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737407.003.0003>
- Lønborg, J. H., Viveros, M., Aguilar, R. a. C., Lakner, C., Ibarra, G. L., Nguyen, M. C., & Mahler, D. G. (2025). September 2025 global poverty update from the World Bank: New data and regional classifications. *World Bank Blogs*.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opendata/september-2025-global-poverty-update-from-the-world-bank--new-da>
- Mulinge, M. M., & Lesetedi, G. N. (1998). Interrogating Our Past: Colonialism and Corrup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Africaine de Science Politique*, 3(2), 15–28. <http://www.jstor.org/stable/23493651>



Sun, Y. (2016). Africa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brookings.edu/>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frica-in-chinas-foreign-policy/>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4). Our work in Africa | UNEP -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https://www.unep.org/regions/africa/our-work-africa>

van de Walle, N. (2007). The path from neopatrimonialism: Democracy and clientelism in Africa today.
<https://www.einaudi.cornell.edu/>
<https://ecommons.cornell.edu/items/65198cf8-0342-4b3d-8c18-a8202755e666>